

陶秋英纂輯 姜亮夫校讀

敦煌碎金

浙江古籍出版社

陶秋英纂輯
姜亮夫校讀

敦

煌

碎

金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新登字374号

扉面题字 祖 韵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责任编辑 寿勤泽

敦煌碎金

陶秋英辑录 姜亮夫校订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之江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体育场路92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5 字数80千

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

书号: ISBN7-80518-164-0/H·6

定价: (精) 7.60元

敦煌碎金序

右凡敦煌经卷中零杂而精要之资料五种其大德录经生录寺塔录及正俗或亦字体录四种皆各有年时可寻则依此以定新见经卷其时代先后皆可较量而知之此亦可作工具书用非仅为写官之参考也忆余撰敦煌诸作时陶夫人怜其损目弱躯也愿分为此种业迹时夫人大病方渐霁不自惜而惜余十餘年之相知非苟然也今辑录其辛勤之作则墓本已拱矣伤哉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六日亮夫志之

导言

一卷子补佚

余忆曩昔与王重民、向达两君同于巴黎、伦敦校读敦煌卷子，尝言卷子中最多者为佛经卷子。然巴黎、伦敦所藏佛经卷子，与现今流传之佛经相较，亦多有亡佚。惟日本《大正藏》尚收录较多佚经。而《大正藏》又多有讹误，向达君尝告予曰：「《大正藏》所录佛经，余尝校阅两卷，非独字有誤，且颠倒綴合之处亦不少。故亮夫兄关于校理佛经之提议，至为重要。惟此事甚难，若欲完成之，则非有能懂佛经者百

餘人从事之而不可。余靜思其言，深以為然。而于其時，因能為此事者，僅重民、向達與余三人耳；遂合作而黽勉之。

程序一：搜求原卷。重民先生嘗以其所遇之疑難寫信告予。其一即為許多原卷無以綴合。此事吾等三人皆無從解決。遂請示中央，望能向天下各公私藏卷者購求原卷或顯微片子。因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損裂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況，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處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倫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設法將其收集一處，方可使卷子復原。而此事至難，欲成不易。余在西歐時，即知蘇聯列寧格勒有敦煌卷子，而其時即禁止對外。如今，蘇聯所藏敦煌卷子已編目公世，至為可喜。安得天下各公私藏家皆能獻玉，

则事可成矣。

程序二：定时代及译者。重民先生来信第二事言其所见佛经卷子多有难定年代者。此事予早有思虑。余为《瀛涯敦煌韵辑》书时，吾妻秋英念予劳累，愿承担小事以相助。余遂囑妻将卷中凡见高僧名、寺观名一一辑录；若遇名称下有年代者，更应全录之。依据僧名与寺塔名，便可推断卷子年代矣。余以此事相告，重民先生大喜，敦促及早公诸于世。

程序三：编检索工具。重民君所示第三事，则为对如许敦煌高僧大德，若无一完整之索引，亦甚难深研，故欲为之。余大笑曰：「吾二人不谋而合矣。」因重民君所为之事，余在云南大学时既已为之，惜其时助我为此事者，于佛学不甚了了。

如「释某人」之「释」，乃僧侣之通姓，自不能作姓氏笔划，它如「竺」_下「焉」_下诸字，同类。而此人均将其作姓氏笔划连缀而上矣。此索引急需改动修订，只恨年来身体欠适，惟待将来培养有为青年替余修订出版矣。若修订索引可出，则于敦煌研究大有便利。因据此索引，可核对全部敦煌材料。

以上三事，为校读敦煌卷子最基本之工序。此外，尚有如下数事特需注意。

a 字体问题。卷子中，以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三家字体居多。字数少者；由一人抄毕，如《道德经》《心经》之属，故字体一贯。而大多卷子字数多达三五千以上，其中由一人抄毕者亦不少见，然以二三人乃至五六人抄一卷者

居多，故一卷中便有数种字体，且字体有优劣之别。若以字体断卷子年代则往往出问题。

或卷中偶有年代记录。然此年代，或为抄卷首者所为，或为抄卷尾者所为。一卷之中，因前后抄卷人不同而年代有异，虽亦偶有统一者，然以此定卷子年代，终属危险。

敦煌卷中尚有韵书卷，余断定其中或为女子抄写。余于王仁昫卷韵书中发现有女子所用之胭脂迹，且字体秀丽工整。唐代有女子抄卷之事，或为丈夫迎考而作，只因其不署姓名，故难以辨别。世传吴彩鸾善抄卷，余细加研讨，尝指出某卷即为吴氏所为（事详余《吴彩鸾书切韵事辨》文）。明清两代大内中，藏有两卷韵书，世传皆为吴彩鸾所抄。余以两卷相

较，虽字形相仿，然字体不一，故亦不可轻易混淆。

b 用纸问题。大体而论，佛经卷以楮砂粗薄纸抄写。

细细考索，盖中唐前佛经用纸较好，中唐后则渐差。而道教卷子用纸则特为讲究。如《道德经》用纸，坚硬厚实，至今千余年后，触之尚能发出吭喳声。其抄卷者亦大多为高僧大德，字体秀美。此或与李唐帝王自称老子之后而崇奉老子有关。佛经中虽亦偶有用硬黄纸者，然惟民间信仰之最要者如《金刚经》《心经》《观世音菩萨经》之属方用。

敦煌卷子所用纸张，来源不一。其中有四川纸，因为敦煌卷中有「入成都纸」之记载。其时成都造纸最有名者为勾中正。勾中正名字于敦煌卷中常见。盖当时有四川人抄经卷而与敦

煌卷相交换之事，以致敦煌卷中有四川用纸，而四川文献中亦有敦煌卷子。故以四川文献考敦煌卷子，亦为一法。

C 款式问题。敦煌卷子用纸大小基本一致，约当一尺餘（三十公分稍多）。大体每纸书写十九至二十行，共十七至二十一字之间。小注亦占一字格。若遇注文较多，则一字格书写二至三字之注文。若字抄错，中唐前往往往将纸倒转而倒抄下，至中唐，此类情况便少见，至唐末张议潮后，便不再倒写，如有错字辄涂划了之。

卷子中或有小孩练字时所抄之卷。如某卷即署有「七岁童子张议潮书」字样。敦煌卷抄写款式尚有两种情况。一为只抄一面，故纸可折叠装订。一为正反两面均抄写，故只能成长

卷无以折疊。此类卷子往往正面一经而背面另一经，而其正反经抄写时代又不同，余尝发现纸背抄写年代有早于纸面年代者。故此类卷子，其年代更难断定。

d 附图。或卷中有附图。其内容以维摩诘问病事为多；其次有关于释迦牟尼生死者；还有房屋建筑图，亭台楼阁俱备，而又不见有完整之房屋；此外则为更杂乱之内容，如一树枝、一女人像，等等。卷中附图，以唐代前为多，唐后大画家出，而卷中佛画反减少矣。此俱可为读敦煌卷时所留意。

E 历法。约五代稍后，敦煌有二人对「历」颇有研究，其中一人为翟奉达，著有三种「具注历」。其内容比《汉志》所载「历注」更详尽。汉代注简约，而翟注则扩充矣。余尝写

有《瞿奉达与「具注历」》一文，寄北京友人向达。余之所以提瞿奉达其人，乃因瞿奉达《具注历》中推算年代与他人颇有不同。若遇瞿奉达「历」与唐代通行「历」并行时，便有年代出入之处。此亦为研读敦煌卷子所极需注意者，故特于此一提。

二 翻译高僧

高僧大德之名号于卷中时见。除敦煌高僧外，犹有外来高僧，如鸠摩罗什、昙摩密多即为西来之译僧。鸠摩罗什译有多种经卷，如《大智度论》，还有单文如讲音韵者。余于巴黎即见有鸠公之译文与论文。然《高僧传》不载什公文章

事，足见其作品遗失不少。其余高僧所译经卷，情形盖亦相仿。故凡敦煌高僧所译之经卷，无论其出于伦敦或巴黎，俱可用以补充旧藏经之缺憾。如敦煌本《观世音经》与现今传本即不同，自可据以校勘补充。

三 经生抄经

敦煌经卷题识中书写经生及收藏经卷人名颇多。其卷有直接关系，为考订卷子年代必不可少之材料。其抄写经生约可分为两类：一为信奉佛教之僧徒，于佛经本有研究，故其所抄经卷，错误较少；一为不懂佛学之人，仅以抄经以绮字耳，其中以儿童居多，字体虽不秀美，书写极其认真。

其中有张议潮儿童时代所抄之经。张议潮乃世家子弟，由此可知当时世家儿童接触佛学之事颇常见。张议潮后，直至北宋初期，抄写经生名字署于经卷者仍屡有可见。只因抄写经生大多不熟佛学，故卷中错误亦屡屡可见，多看原卷，便可知晓。

敦煌经卷中有外地流入者，其中以四川、浙江、金陵为多。其间区别，只需从用纸大小或纸质优劣入手，便可辨晓。如金陵纸比敦煌纸宽长，浙江纸比敦煌纸质地差，等等。出于不同地域之经纸，其抄写经生自亦不同。故读敦煌经卷，于此特需注意，切不可匆忙混同，更不能以浙江、金陵等处与经人之年代以断定敦煌经之年代。

四 寺塔名称

寺塔名在敦煌卷中极多，余读卷时曾录下三十余个。除一般寺塔名外，尚有「兰若」。兰若本为较小世家私有之庙宇。全部敦煌寺观名约有六十多个，而其主要者或即敦煌较大之石窟。盖当时每一石窟即题有一窟名，而今已无法确指此类石窟名即现今敦煌石窟之第几窟矣。史岩先生、苏白先生，乃至张大千先生，于此皆有所讨论，向达先生文章中还论及榆林窟之窟名。此事虽在敦煌学上非第一重要事，然亦为断定卷子提供较好材料。亦有人从窟名与窟舍内容之间进行探讨，以期寻得若干相同之消息。此实为一种有效之法术，

伯希和即曾运用。伯希和与斯坦因窃窟时，其门楣上或许尚有窟寺名之痕迹，因伯希和卷子中有「某某寺窟」之记载。此实为重要之线索。有些寺塔、兰若名已无法确其含义，如「周家兰若」之「周」，究为何指，已无法指明。尚有若干窟塔，疑为西域人入敦煌后所开凿，因敦煌石窟与吐鲁番石窟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见其间有一定联系，此足启人思考。唐代诗人所写关于长安诗文中时常出现「兰若」字样，此又说明确敦煌世家兰若于唐代之前即已传入长安矣。从吐鲁番石窟到敦煌寺观至长安兰若，期间自有一条沿进规迹在，于此入手研究敦煌亦不失为一种方法，王重民夫人对此曾有研讨，惜未见公布结果。